

QINGNIANXUEZHE



刘国瑛 著

CONGSHU

心态与诗歌创作

青年学者丛书

I207.2
1267

青年学者丛书

心态与诗歌创作

——大历十才子研究



刘国瑛著·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沈蓉男

心态与诗歌创作

大历十才子研究

刘国瑞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200,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0510-865-X/I · 302

定价 9.65 元

引言

“唐诗”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初、盛、中、晚唐的分期划出了唐诗递嬗演变的轨迹。唐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前一阶段为自己的前提和出发点，而每一个阶段的探索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活跃在唐代宗年间的大历十才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正处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从唐诗发展的角度看，则处在由开元、天宝年间的高潮转向贞元、元和年间的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一群诗人“皆负当时盛称”^①，他们以其敏感的诗心直接把握时代的心理节奏和情绪特点，揭开了中唐诗歌的帷幕。

然而，对大历十才子的评价，历来莫衷一是。《唐人选唐诗十种》中有五种收录了十才子相当数量的诗歌，评价甚高。而对其偏颇的理解又几乎与诗论家对唐诗分期的注意同时开始，严羽首肇其端：“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②此后，评论者大多根据自己的好恶，给予大历十才子并不公允的评价。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仲文集条下说：“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才子实为之职志。”把诗道中落之罪归于大历十才子。

在建国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仅仅用一种固定

的尺度——社会学、历史学加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尺度无疑是重要的)来评判作家作品,而很少从美学、文艺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习惯于作单个作家的事迹考证和单篇作品的义理分析,而很少对特定时代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作宏观上的思考;习惯于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作随意的、概念化的演绎,而很少对作家作品的审美倾向、美学价值进行多样化的概括。在大历十才子及其诗歌的评价上,许多论者不顾及十才子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特殊心态,不是以抒情诗的艺术、美学标准去体察十才子的艺术情感,而是睁大一双“真实”的眼睛到他们的诗中寻找现实性的题材、画面和形象。我们只要翻一翻国内两部最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就可见一斑。或曰:“他们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大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③或认为,大历诗坛“泛滥过以钱起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逆流”^④。这样,把这个闪耀在中唐诗坛的星群逐出了诗的星空。

不错,大历十才子多赠酬题唱之作,如果仅从数量上估算,是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不幸的是,这种线性的因果关系的简单推理导致了人们对十才子的深入研究,其结果,不仅误解了抒情诗的内容,并失之片面化、狭隘化,而且漠视了十才子的心灵色彩和诗歌的审美价值。

近年来,人们开始用审慎的态度重新评价大历十才子。我们高兴地看到,评论者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评论者在把握抒情诗的特质来揭示十才子的心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方面,在发掘其诗歌的审美特征等方面,仍然是很不够的。从研究方法上看,我们如果仍然停留在重新替诗人排座次、争地位上,仍然从作品中寻找几条例证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的话,那么,就很难把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阶段。

我们对大历十才子的重新评价，不仅仅是出于对公允的呼唤和宽容的期许，而是出于对文学史上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的重新思考。我们认为，在评价大历十才子时，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应当正确理解抒情诗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方式”的著名论断。诗歌之所以有别于其它艺术门类，就在于它偏重的不是对现实的述说，而是对从现实所升华的感情的抒写。由于抒情诗主要是表现客观现实所引起的情感体验，所以它能以多色调的主观情感折射出多姿多彩的生活形态。另一方面，诗人的内心是一个独立的丰富的世界，诗人“自己就是一个主体的完善自足的世界，所以无论是作诗的推动力还是诗的内容都可以从他自己身上去找，不超出他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情境、情况、事件和情欲的范围，抒情诗人凭他的内心世界本身就成了艺术作品”^⑥。因此，作为审美主体，诗人的内宇宙本身就是诗歌观照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心灵而且是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才能成其为艺术作品”^⑦，或者说，“抒情诗的内容是主体（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观照和感受的心灵”^⑧。也正因为此，“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⑨。大历十才子由宏阔的外部世界逐渐潜沉于个体的内心领域，通过表现诗人的细微深婉的心态来体察人生，审视现实，解悟历史。并非只有表现阶级斗争、反映民生疾苦的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品——这类作品无疑有其自身的价值——才能算是内容健康、积极的。更何况大历十才子的诗歌还有不少悯时伤乱、忧国忧民之作，只是与盛唐诗歌抒写那强烈外射的、爽朗的、开阔的情怀不同而已。正是十才子开拓了盛唐诗人光顾不多的诗歌领地——主体的心灵世界，才使得唐诗的抒情特质更加丰富、更加完美。

第二，必须把握大历十才子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要

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⑨。大历十才子生活在一个充满忧患、苦闷的时代,现实逼使他们的目光向内凝缩,促使他们将诗的触角伸向审美主体的心灵深处,他们深藏着盛唐诗人所没有的剧烈的楚痛,其诗表现了特定时代的特殊心态。可以说,大历十才子的诗是时代与心灵的宁馨儿。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灾难现实给诗人们带来的痛苦震颤。

第三,应当把大历十才子的诗歌视作美的一种形态。诗是由多种价值、多重意识复合的有生命的美感载体,我们不能对原本是多维的美学价值作出单一的规定。如果只从某个认为唯一可能的截面去考察诗歌,那么无疑会导致把立体的精神现象挤压成一个平面。我们历来反对排斥政治的参照体系,但功利观不是狭隘的、庸俗的。诗作为一种和社会性相连的精神产品,应在审美层次上整体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追求经过感知、理解、情感、想象等多种心理功能的综合和协调运动产生的美感。大历十才子的诗歌作为时代精神和主体情感的具有审美性质的物化形态,自有与盛唐诗歌大异其趣的美学风貌和审美价值。

第四,应当看到,诗人对现实的审美把握受诗人的心态、审美心理及整个心理结构模式的制约和影响。歌德曾感叹:诗的基本原则“太属于精神世界,太缥缈了”^⑩。其实,精神世界这一内宇宙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诗人在体验、把握审美客体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因现实生活变化而变化的心态特征、审美心理的范导之下。马克思曾说过:“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发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发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取自身。”^⑪大历十才子的诗歌是一种抒写心灵的艺术,他们总是在其心态模式、审美心理的规范下,在特殊的对象世界中进行自我观照活动。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试图把大历十才子置于一定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历史背景上，由心灵的创造活动——诗歌创作去探视创造者们的心灵，既把大历十才子诗看作客观历史过程中的文学反映，又把它们作为活的心灵的创造物，由此寻找客观性与主观性在具体作品中的联系及其联系方式，并由这个特殊的艺术世界来体察他们的审美心理和创作倾向，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坐标上揭示出十才子诗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以寻找他们在文学史上应处的位置。

注：

- ① 卢纶《酬畅博士当感怀前踪五十韵》。
- ② 《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 ③ 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第2册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2册第329~3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⑤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9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二版。
- ⑥ 同上，第一卷第49页。
- ⑦ 同上，第三卷下册第99页。
- ⑧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⑨ 丹纳《艺术哲学》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 ⑩ 《歌德谈话录》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目 录

MULU

引 言 1

第一章 大历诗歌巡视 1

第一节 由“大历十才子” 的主名说起 1

第二节 中唐前期诗坛鸟 瞰 9

第二章 心态与心态模式 27

第一节 心态的现实依据 27

第二节 大历十才子的心 态特征 30

第三节 心态模式：首鼠 两端的踟蹰 52

第三章 大历十才子的审 美心理特征 64

第一节 审美感受：伤感 凄凉 64

第二节 审美情感：弥散 冲淡 67

第三节 审美想象：僵仄局促	71
---------------	----

第四节 审美理解：直觉式的体验与把握	74
--------------------	----

第四章 大历十才子的创作倾向 83

第一节 体状风雅	83
----------	----

第二节 理致清新	90
----------	----

第三节 心灵的远游	98
-----------	----

第五章 送别：倾诉人生聚散依依的心曲 111

第一节 世路相逢各未闻 百年多在别离间	111
------------------------	-----

第二节 举目情难尽 羁离失志间	117
-----------------	-----

第三节 十才子送别诗的创作特色	129
-----------------	-----

第四节 送别诗的意象系统	137
--------------	-----

第六章 山水：情感落差的补偿 148

第一节 风景随摇笔 山川入运筹	148
-----------------	-----

第二节 心中山水的尽情抒写	156
---------------	-----

第三节 山水诗的审美特征	162
--------------	-----

第七章 边塞：特殊年代的人生写照 176

第一节 写不尽的情思内容	177
--------------	-----

第二节 塞鸿过尽残阳里 楼上悽悽暮角声	190
------------------------	-----

第八章 审美特质——形象的二重世界 197

第一节 意境：空疏萧散与幽深淡远	197
------------------	-----

第二节 表现：深微细腻	205
-------------	-----

第三节	从审美意象到形 象的二重世界	214
-----	-------------------	-----

第九章	诗变于盛衰之间	227
-----	---------	-----

第一节	格调：从大鼓啞 嗒到洞箫幽咽	227
-----	-------------------	-----

第二节	律诗：由“尚未齐 备”到“齐备”	239
-----	---------------------	-----

第三节	诗风：从雄厚浑 成到清婉雅秀	248
-----	-------------------	-----

后记		259
----	--	-----

第一章

大历诗歌巡视

第一节 由“大历十才子”的主名说起

中唐诗坛的序幕是由大历十才子揭开的。他们以其独特的诗歌创作，彪炳于中唐前期诗坛，辉映于后世。严羽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晚唐体……”①严羽依据历史的逻辑发展，勾勒了中国古典诗歌递嬗演变的轨迹。然而，关于大历十才子的主名问题自北宋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必要仔细考辨。

“大历十才子”的称号及主名，最早见于中唐人姚合的《极玄集》。该书卷上李端名下注说：

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历校书郎，终杭州司马。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所撰《新唐书·卢纶传》沿姚合之说，云：“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皆以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姚合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进

士，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不远，他的记载应当说是可靠的。从中唐到北宋，关于“大历十才子”的主名，一直没有什么争议。但自欧阳修以后产生了与姚说不同的种种看法，被列入十才子名单的竟达20人之多。计有功《唐诗纪事》认为大历十才子应是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冉、耿伟、李嘉祐。江休复在《嘉佑杂志》中，去掉了韩翃、崔峒，加进了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皇甫曾。南宋严羽则认为冷朝阳应为十才子之一。又据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抄》卷十八记载，有刘长卿、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而无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此说影响较大，已被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所采用。管氏是以这些人所留存的作品多少为根据的，把存诗极少的夏、吉略去。这看似有理，其实并不符合当时号为大历十才子的原意。如被删去的崔峒，当时的选本《中兴间气集》就选了他9首诗，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清代诗论家王士禛曾感慨道：“唐大历十才子传闻不一……发、审诗名不甚著，未可与诸子颉颃，且皇甫兄弟齐名，不应有曾而无冉，又韩翃同时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③

以上诸家说法都有所据，并非信口雌黄。在当时，李益、李端并称“二李”，钱起、郎士元并称“钱郎”，钱郎又与刘长卿、李嘉祐齐称“钱郎刘李”。明人胡应麟分析这种众说不一的原因，颇有见地。

《唐书·卢纶》明言吉中孚、夏侯审、钱起、李端、苗发、司空曙、韩翃、耿伟、崔峒与纶为十才子，其初人数如此，惟中孚、审制作无闻，可疑，而纶有怀中孚峒发曙端伟兼寄夏侯审侍御七子诗，则中孚与审实为才子之列。而韩翃、钱起不与，恐其间有章句脱落，否则别有故也。或去中孚、审与翃、峒，而益皇甫曾、李嘉祐、郎士元、李益，其人才视前虽胜，而非实录。余尝历考古今，一时并称者，多以游从习熟，倡和频仍，好事者因

之以成标目。中间或品格差肩，以踪迹离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绝，以声气合而不得离，难概论也。^③

他认为原因的产生是各人根据“人才”即创作成就的高下并以各自的标准加以损益，将自己认为最“能诗”的人列入“大历十才子”之中，而不是“实录”。据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大历间可称才子者不下三四十人。若论才气，则有张继、严维、朱湾、常建、刘长卿、包佶；若论诗之多寡，戴叔伦、顾况、皇甫冉、刘长卿等人的存诗都在百首以上，然终或以“踪迹离”，或以气质异而不能合。

既然认为姚合之说可信，那么，他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其实，他说得十分明白，“十才子”的名称源起于“唱和”，而不是按当时诗坛情况而排的座次。十才子“游从习熟，倡和频仍”，其间虽才情有别但声气相通，而那些水平相近而“踪迹离”者则不能并称。这种情形不绝于文学史，唐前有“建安七子”等，唐后有“苏门四学士”、“江左三大家”等，以唐代言，则有“四友”、“三俊”、“吴中四士”、“庐山四友”、“咸通十哲”等等。

那么，“唱和”说能不能成立呢？

考十才子现存诗作，卢纶、耿伟、李端、钱起、司空曙、崔峒等人相互赠答酬应之诗很多，苗、吉、夏侯诗极少，但卢、李、司空诸人有许多诗是与他们唱酬的。细检大历年间的诗歌，我们发现：一、当时与卢纶等人“唱和频仍”的还有李嘉祐、刘长卿、严维、郎士元、秦系、畅当。以畅当言，卢纶集中就有赠诗14首，耿伟、司空曙、李端均有赠作，可畅当却从未被列入十才子当中。二、现存韩翃诗中只有涉及钱起的一首《褚主簿宅会毕庶子、钱员外、郎使君》诗，两首送夏侯审诗，即《送夏侯审》、《送夏侯书归上都》，而诸人集中与韩有关的诗罕见，只有钱起一首，即《同王绾起居、程浩郎中、韩翃舍人题安国寺用上人院》。可见诸人与韩翃的来往很少。“唱和频仍”之人如畅当不是十才子，而谈不上“游从习熟”之人如韩翃却在十

才子之列,看来“唱和”之说似乎令人怀疑。

卢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纬、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旧悲,兼寄夏侯侍御审、侯仓曹钊》诗,作于贞元三年(787)^⑤,畅当已为博士后。诗中提到了十才子中的七个人,加上自己共八人,他的“风尘追游向三十载”,“皆负当时盛称”。诗中有“共赋瑶台雪,同观金谷笋”句,说明他们曾在大历年间交往颇深,过从甚密。卢纶为何没有提到钱起、韩翃呢?胡应麟怀疑“恐其中章句脱落”,我们认为是“别有故也”。

钱起为天宝九载(750)进士,生年略后于杜甫,开元二十六年前后曾与张九龄唱和,有《奉和张荆州巡农晚望》诗。他与王维有过交往,大历前即享有盛誉,其生活时代要比其他九人早得多,可以说是老一辈诗人。韩翃一生基本上在藩镇的幕府中度过。代宗永泰元年(765)以前,在侯希逸平卢淄青节度使幕,大历九年后在汴州,历经田神玉、李忠臣、李希烈、李勉诸人幕。他与卢纶等人经历不同,交往也很少。

如果“十才子”并非因“游从习熟,唱和频仍”而冠名,那么,他们一定是因某种偶然的机会才被目为“十才子”的。我们认为仍与“唱和”有关,只是这种唱和不是一般的酬赠,而是在某一特定场合里的唱和,这种场合即郭子仪第六子郭暧经常举行的盛大宴会。

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肃、代以后,勋业富贵称郭令公”^④,“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皆为将相显官……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可胜记”^⑥。其子郭暧:“以太常主簿尚升平公主。暧年与公主侔,十余岁许婚。拜駙马都尉,试殿中监,封清源县侯,

宠冠戚里。”⑩在这样的家族中举行宴会，规模和富贵气象是不难想象的。钱起在《郭常侍令公东亭宴集》中写道：

盛业山河列，重名剑履荣。珥貂为相子，开阁引时英。美景池台色，佳期宴赏情。词人载笔至，仙妓出花迎。暗竹朱轮转，回塘玉佩鸣。舞衫招戏蝶，歌扇隔啼莺。饮德心皆醉，披云兴转清。不愁欢乐尽，积庆在和羹。

又有《奉和郭常侍宴泸川山池》：

掖垣携爱客，胜地赏年光。向竹过宾馆，寻山到妓堂。歌声掩金谷，舞态山平阳。地满簪裾影，花添兰麝香。莺啼春未老，酒冷日犹长。安石风流事，须归问省郎。

这两首诗都着力描绘了园林景色之美、宴乐声色之盛。与前引卢纶“同听金谷箏”一样，钱起也用此典：“歌声掩金谷”。可见，“金谷”乃指郭暖的“名园甲馆”。唐人李肇《国史补》卷上载此宴乐盛事说：“郭暖，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暖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长。”李端这两首题为《赠郭驸马》诗，现存于《全唐诗》卷二八六。

姚合将“十才子”的故事附注于李端名下，显然是因为“十才子”这一名称的产生与郭暖家的宴集有关，而李端又有其特殊作用的缘故。而《新唐书》却移至卢纶名下，显然是认为卢纶创作成就更高一些，欧阳修大概也没有想到姚合这样写是有特殊原因的。《旧唐书》卷一六三《李虞仲传》记李端事迹说：

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郭暧尚代宗女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簾中，诗之美者，赏百缗……

《新唐书·卢纶传》也附载李端事：

端，赵州人，始，郭暧尚升平公主，主贤明有才思，尤招纳士，故端等多从暖游。暧尝进宫，大集客，端赋诗最高……

李端大历五年登进士第。在此之前曾应试落第。落第归乡时耿纬有《送李端》诗：“世上许刘桢，洋洋风雅声。客来空改岁，归去未成名。远近天初暮，关河雪半晴。空怀谏书在，回首恋承明。”由此诗可知，李端此时已诗名大噪，落第回乡前曾在长安居留多时。耿纬诗此比李为刘桢，李端自己也常常以刘桢自况。如“因恨刘桢病，空园卧见秋”^⑦。李端诗风与刘桢迥异，比之于刘是取建安七子之意，以说明李端是“十才子”中之佼佼者。“李端擅场”正是其背景。李端《长安感事呈卢纶》言道：“十五事文翰，大儿轻孔融。长裾游邸第，笑傲五侯中。”写的正是当年情状。年轻气盛，风流倜傥，虽未及第，但早有诗名。郭暧家的这次宴集唱和，时在李端登第前后，即大历初几年间。

《旧唐书·钱徽传》记钱起事云：“大历中，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形于图画。”十才子之名，当从此时开始。姚合《极玄集》所记十人是不错的。

现在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其余九人当时是否都在长安，是否都有可能参与郭暧的宴集？

卢纶于代宗广德二年(764)由鄱阳返回长安，“大历初，数年进士不入第”^⑧。

耿纬于大历初年由周至尉入朝为左拾遗，前引《赠李端》诗是送李端下第归乡时作，说明耿纬当时在长安。

司空曙有《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诗，同时和诗的有钱起、卢纶、独孤及等人。常袞为中书舍人是在永泰元年到大历九年，而独孤及于大历三年五月即出为濠州刺史，可见司空曙大历初也在长安，并且与卢纶、钱起等人酬唱。^⑨